

汉唐戏剧中参军服色与《舆服志》的关系

董 怡

(西南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 重庆 400715)

摘 要:传统戏剧服饰是中国传统服饰中的一个分支,在其产生和程式化的过程中受中国历代传统服饰的影响,并受制于历代《舆服志》的相关典章制度。通过对汉唐戏剧中参军服饰色彩的研究,从对应关系和变化规律两个角度探讨其与《舆服志》的相关性。研究表明,汉唐戏剧中参军服色和同一时期《舆服志》的相关记载有较强的对应关系,并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呈现同步性和部分滞后性特征,且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戏剧服饰色彩的程式化端倪。

关键词:《舆服志》;汉唐;戏剧;参军;服色

中图分类号:TS 941.7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20)05-0444-05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lor of Canjun Costume in the Drama of Han and Tang Dynasties and *Book of Carriages and Dressings*

DONG Yi

(College of Textile and Gar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drama costume is a branc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lothing. In the process of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it i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traditional clothing. The drama costume is also confined by the policies of the *Book Carriages of Dressings* as well. This work dealt with the color of canjun costume in drama concerning Han and Tang Dynasties. Studies were based on two perspectives, namely,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and changing rule.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trong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color of canjun costume and the *Book of Carriages and Dressings*. And they showed synchronism and partial hysteresi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 Besides, it appeared some stylized clues of colors in this period.

Key words: *Book of Carriages and Dressings*, Han and Tang Dynasties, drama, canjun, dress color

中国冠服制度,于夏商时期建立,到周代基本得到完善,在春秋战国时被正式纳入礼制,成为历朝统治阶级为了明确且强化等级次序的重要手段之一。冠服制度包括服饰的形制、材质和图案等多个元素,其中服色更是自隋唐起被明确和细化,黄、紫、绯、绿、青等色彩自此被归纳在一个代表阶级地位、官品高低的直观视觉体系中,并成为后朝“易服色、别衣服”的重要参考依据。冠服制度大都被史官撰写在关于前朝的史论典籍中,归纳在《舆服志》

的条目之下,贯穿于整个中国服饰史。

传统戏剧服饰作为中国传统服饰中的一部分,它的产生与人们的生活有关,与舞台表演的要求有关,与戏剧自身的发展状况以及所属戏班的物质条件等有关。传统戏剧服饰在其发展和程式化的过程中,各项构成元素受到了中国历代传统服饰特点的影响,并受制于历代《舆服志》的相关典章制度。文中以汉唐参军角色服饰色彩为研究对象,并对照同一时期《舆服志》中相关记载进行分析,从中探寻

收稿日期:2019-10-28; 修订日期:2020-02-09。

作者简介:董 怡 (1972—),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戏剧服装及传统服饰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等。Email:743139571@qq.com

中国传统戏剧服饰的发展脉络。

1 参军戏服饰及其颜色

参军戏是唐宋时期盛行的一种戏剧表演形式,主要由参军、苍鹅两个角色作滑稽对话或动作,引人发笑,用以讽刺朝政或社会现象^[1]。关于参军戏的起源,目前学术界尚未有定论,其中主要有“汉代石耽”和“后赵周延”说。

现有汉唐参军戏服装色彩的相关资料主要来源于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其中文物主要为可识别其服装色彩的唐墓参军戏俑。关于这些参军戏俑的身份尚有部分学者存疑,疑点主要是这些参军戏俑一般以成对形式出现,虽身着绿色和黄色袍服,表情夸张滑稽,和文献中参军戏描写的人物表演状态非常相似,但这些成对戏俑的服饰有的几乎完全一致,并无参军和苍鹅之分。参军、苍鹅两角色扮相差异的早期文献见于唐,但早在唐之前参军戏就存在,而与之相关的记载中并未单独列出苍鹅一角,也并未专门指出苍鹅扮相与参军的不同。因而笔者认为,在汉唐某些参军戏中,这两种角色的服饰相近或基本一致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文中将这些唐戏俑一并作为辅助资料进行分析。

汉唐参军戏中参军一角的服饰主要有巾幘、黄绢单衣、白夹衫、绿衣4种,服色包括黄、白和绿3种。“巾幘、黄绢单衣”见于宋李昉的《太平御览》,书中记载后赵时期“石勒参军周延,为馆陶令,断官绢数百匹,下狱,以八议宥之。后每大会,使俳优著巾幘、黄绢单衣。优问:‘汝为何官,在我辈中?’曰:‘我本为官陶令。’斗数单衣曰:‘政坐取是,故入汝辈中。’以为笑。”^[2]1973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阿斯塔那第206号墓出土的唐代傀儡戏俑上也可以看到这种服饰。这座隶属张雄及其妻子麹氏的墓葬中,有两个木偶头戴乌纱帽,身着黄绢单衣、白裤,系黑带,穿乌皮靴,或歪嘴斜目,或翘唇瞪眼,具有明显的嘲弄表情^[3]。金维诺等^[3]根据墓俑形象、服饰来推断,似乎这时表演的内容已与盛唐时期的“弄参军”有一定关系。此外,2001年在甘肃庆城县城北出土的唐游击将军穆泰墓中发现的3件参军戏俑中也有黄色服饰。文献[4]中记载:“标本M2:21头戴高顶黑帽,帽顶扁平,形如矛头,帽檐上卷,并饰以彩绘,头略朝右,左眼圆睁,右眼紧闭,咧嘴大笑作滑稽状。身着橘黄色团领窄袖开襟长袍,在袍前交口处,装饰朱红色与白色的团花纹,腰

系黑带,左侧带下缀黑色皮囊……标本M2:23戴黑色巾幘,帽顶高耸,面部表情生动滑稽……身着浅黄色团领宽袖长袍,腰间束带,后袍裾向上翻卷,双手拢袖于左腹前……加上马、骆驼等,说明墓主人受到了外来文化和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唐时中外往来的情况。”由此可以看出这两件戏俑具有明显的西域特征。

“白夹衫”见于《乐府杂录》“俳优”条中记载:“开元中,黄幡绰,张野狐弄参军,始自后汉馆陶令石耽。耽有赃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乐,即令衣白夹衫,命优伶戏弄辱之,经年乃放。后为参军,误也。开元中有李仙鹤善此戏,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参军,以食其禄,是以陆鸿渐撰词云‘韶州参军’。盖由此也。”^[5]此戏的开端和其他参军戏一样,都有与之对应的真人真事,真实案例中后汉的石耽“衣白夹衫”,那么唐朝的俳优李仙鹤,想必也要象石耽“衣白夹衫”才能做到“善演”了。

“绿衣”的记载出现在肃宗在位时期,“肃宗宴于宫中,女优有弄假官者,其绿衣秉简者,谓之参军桩。”^[6]《新唐书·肃宗七女传》中也有记载“阿布思之妻隶掖廷,帝宴,使衣绿衣为倡。”^[7]西安西郊发掘的唐故云麾将军、右领军卫将军鲜于庭海墓中也有着绿色袍服的参军戏俑,这对后被定义为参军戏俑的男性俑在最早的发掘简报中和11号胡人俑一起被划分为侍俑。报告中记载:“俑4和俑5二俑的服饰等均同,头戴软巾,身穿圆领窄袖绿色长衣,腰系带,足穿长筒靴,面带愁容,4号俑身微向右侧,两手供举胸前;5号俑则身微向左侧,两手圆垂腹下。”^[8]现这对参军俑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绿衣”作为唐后期参军戏中参军这一角色的主要服饰,逐渐被固定下来,并在宋朝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2 汉唐参军服色与《舆服志》中服色的相关性

2.1 参军服色与《舆服志》中服色的对应关系

2.1.1 白色 白夹衫可拆分为“白”和“夹衫”两个部分,即前者为色,后者为型。夹衫,即一种有面有里而无内部填充物的双层服装。

“每宴乐,即令(石耽)衣白夹衫”的真实故事发生在汉和帝时期,《汉·舆服志》中关于白色服装的记载出现在祭祀用服时,有“百官执事者,冠长冠,皆祗服。五岳、四渎、山川、宗庙、社稷诸沾秩

祠,皆衲玄长冠,五郊各如方色云。”^[9]方色,即青赤白黑。《后汉书·礼仪志下》也有“登遐,皇后诏三公典丧事。百官皆衣白单衣,白幘不冠”^[10]的记载,其白色为丧服色。《旧唐书·舆服志》中有天子“黑介幘,白纱单衣,白裙襦,革带,素袜,乌皮履,拜陵则服之”以及“白纱帽,亦乌纱也。白裙襦,亦裙衫也。白袜,乌皮履,视朝听讼及宴见宾客则服之。”^[11]该记载中,白色是作为天子的祭祀服色和便服服色,除《舆服志》以外,汉唐及其以前服饰关于白色的其他含义还可以从《中国古代服饰词典》中一窥端倪。书中收录汉唐及其以前各种文献记录的白色服饰共 40 种,其中冠类 16 种,服装类 16 种,其他类 7 种,整体服饰类 1 种。服装类中,秦汉时期有白单衣、白服、白衣冠;魏晋时期有白貂裘、白袷、白袍等;唐朝有白衫、白襦等。笔者将白色的属性概括为以下 7 种:①官吏便服之色;②庶民之服色;③凶服丧服之色;④未入仕途者之服色;⑤降服之色;⑥道教仙人之服色;⑦隐士之服色。另外,在该词典记录的白色服饰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白袷和白夹衫在色、形上最为相似,辞典中关于它的解释为:“白色双层无絮的衣服,平民服装,多用于春秋天微凉时节。”^[10]

《乐府杂录》中石耽的着装非祭祀用服,其身份和状况与《中国古代服饰词典》中提到的后 5 种着白服者身份明显不同,笔者推断,这里的“白”可能与官吏便服和庶民之服的色彩有关。白色服装作为官吏便服之色的记载见于《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宋元嘉世,诸王入斋阁,得白服裙帽见人主,唯出太极四厢,乃备朝服……宫内曲宴,许依元嘉,嶷固辞不奉敕,唯车驾幸第,乃白服乌纱帽以待宴焉。”^[10]如果白色是南齐官吏的便服色,也就是汉朝宗室和贵臣在宴乐时所穿便装的颜色,那就无法解释第 1 节中提到的《乐府杂录》“即令衣白夹衫”^[4]中“令”一词的意义。“令”字有命令的意思,即不是当时石耽正常应该服用的服装,又故意为之,甚至有“扮”的指向。故这里的白夹衫做官吏便服之解并不成立。

相比之下,石耽衣白夹衫或许更符合他已被革职贬为庶民的缘故,孟祥笑等^[12]论文中提到“《东观汉记》称郑钧有贤名,拜侍御史,迁尚书,告归,敕赐尚书禄其终身,时称白衣尚书。”^[12]并由此做了同样的推断,而这也符合《隋书·礼仪制》:“至六年后,诏从驾涉远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已上,通着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

绿,袍,胥吏以青,庶民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13]的规制。

2.1.2 黄色 《旧唐书·舆服志》中记载:“燕服,盖古之裘服也,今亦谓之常服。江南则以巾褐裙襦,北朝则杂以戎夷之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虽谒见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会,一切通用。高氏诸帝,常服绯袍。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文绦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黄袍,出入殿省。”^[11]到隋炀帝大业六年,“复诏驾涉远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已上,通着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民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11]与唐代魏征等著的《隋书》中记载一致。由此可见,黄色在唐以前并非皇帝的专用色,不仅“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黄袍”,甚至连士卒的服饰颜色也被指定为黄色。“武德初,因隋旧制,天子燕服,亦名常服,唯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11]到武德初年,黄色有了细微的色相界定。武德四年,即公元 621 年唐高祖李渊统治时期,规定“流外及庶人服紬、縵、布、其色通用黄。”^[11]公元 630 年,“贞观四年又制,三品已上服紫,五品以下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以青,带以鞬石。妇人从夫色。虽有令,仍许通著黄。”^[11]由此可见,从广义上讲唐朝初年黄色的阶级属性并不十分鲜明,甚至被规定为最低阶级和流外之人的服色。至龙朔二年(即公元 662 年),《旧唐书》中记载的关于司礼少常伯孙茂道因为“深青乱紫非卑品所服”而上书请求“望请改八品、九品着碧,朝参之处,听兼服黄”^[11]的事例,也显示出在该时期黄色依旧非皇帝的专用色。

直至公元 668 年,黄色开始成为庶民和官员服饰的忌禁之色。“总章元年,始一切不许着黄。”^[11]因此,黄绢单衣中的黄色是否带有罪服的指向意义,还有待考证,但总章元年前,黄色可以确定是当时普遍穿着的服装色彩。

2.1.3 绿色 在唐以前,诗经中曾有“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14]的句子,在这部表达爱情的诗歌里,绿色应该是当时普通人的常服色彩。到隋炀帝时期,绿色则和绯色一并被明确规定为六品以下的官服用色。

至唐朝,绿色基本成为下等官阶官吏的标志服色,上元元年八月又进一步区分不同深浅绿色的官

阶：“文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并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庶人并铜铁带。”^[11]

关于参军戏中绿衣的由来，任半唐在其《唐戏弄》^[15]一书中有比较深入的探讨。他根据《新唐书·杨炎传》谈及杨炎被贬为道州司马的记载：“自道州还也，家人以绿袍木简弃之，炎止曰：‘吾嶺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祸，安可弃是乎？’及贬，还所服。”^[7]并引用李训传中“训既败，被绿衣，谎言黜官”的记载，认为“惟绿衣与木简，确为唐代贬竄之官所用”“皆可见戏中取此为官服，显然有意避开正官服，故虽假官之长，亦不外绿衣木简而已。特虽同一曰‘绿’，而布帛有殊，泽素有别；绝非朝服、士服、罪服、戏服，于此亦皆一律。料戏服或介乎士服与罪服間耳。”^[15]

在这一个问题上，笔者认为文献^[15]中关于“绿衣是为了避开正官服”的结论并不一定准确。根据《旧唐书》中的记载，绿衣在唐代的官服制度中为低等官服，因而将其用于高等官阶到低等官阶的被贬之官，这一点符合《舆服志》中的规定；但其用绿色而非最低等级的青色，也非庶民的白色，或许和当时该戏中参军一角的真实身份有关，即与真实对象本身被贬等级隶属有关。至于沿用至宋的绿衣是否布帛有殊，泽素有殊，想来应该是因为最初参军戏辱的是“真官吏”，其服饰应该和常服或官服一致，而后辱的是由俳优扮演的“假官吏”，则服饰有可能为特别制作。该戏如在民间演出，则因优人的财力有限，“参军”的服饰更有“不同布帛”的可能，而这个假设也和史料中参军角色为真实的罪吏到演员扮演“罪吏”的变化规律一致，也和生活中服饰到舞台服饰的转变规律一致。

2.2 颜色变化轨迹的相关性

唐参军服饰中黄和绿两种主要颜色与其《旧唐书·舆服志》中的代表属性基本一致，且在时间上呈现了较高的同步性。特别是以“总章元年，始一切不许着黄”为节点，黄色由民众可以随意服用到不可服用，从作为参军服色之一到最终被绿色所替代，这种《舆服志》中颜色规制的变化引起戏剧服饰颜色的变化，充分说明戏剧服饰颜色从最开始的选择到后期的变化都不是随性而为，而是依托于当时统治阶级推行的服饰规制，并成为服饰制度变化更替的又一重要表现形式。

值得关注的是，张雄夫妇墓出土的身着黄绢单

衣的戏俑是张雄之妻麹氏的殉葬品。麹氏死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即在“总章元年，始一切不许着黄”的规定之后，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死于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的唐游击将军穆泰的墓中。金维诺等^[3]推测出现这种服饰“僭越”的情况“只有在装扮历史人物时间才有可能依旧例仍著黄”。笔者认为，导致这种服饰色彩“僭越”的原因，除上述原因外，还有可能与以下情况有关：①《舆服志》约束的为现实生活中的人，而并非傀儡戏中的木偶或随葬戏俑；②从穆泰墓参军俑上呈现的服饰及人物形象所具有的显著异域特征，推断出这两所墓葬地处于民族交融地区，因而其受到《舆服志》的约束较弱，或影响时间滞后。

2.3 颜色的程式化端倪

汉唐参军角色的服饰颜色经历了黄、白到绿的变化，到后期基本固定下来，宋代有很长一段时间参军穿绿衣，此后才根据剧情需要，出现了其他颜色的袍服。这种颜色变化，也是戏剧服装程式化过程中萌芽状态的一个细小缩影。在程式化还未形成之时，戏剧服装的种类因戏而设，不同的戏剧角色匹配不同的服饰，即便是在同样题材和同样类型角色设定的参军戏里，其服色也是各有不同。只有当该种类型的剧目完全固定下来，且同样题材的剧目增多，才有服饰程式化的可能性。

服装颜色程式化是由服装色彩产生到广泛应用，最终到固化的过程，但程式化形成后并非不再发生改变，还是会受到统治阶级相关制度更替及新的社会习俗、新剧目中新角色的产生等多个因素的影响，这种改变在漫长的戏剧服装史中一直存在着，并成为了推动戏剧服装改良更新的原始动力。

3 结 语

汉唐参军角色的服饰作为传统戏剧服饰中一个极小分支，一方面在其颜色属性上，与当时《舆服志》中的相关记载显现出较高的相关性，并且两者在发展变化过程的时间轴上呈现出同步性和部分滞后性特征；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参军服饰颜色由黄、白到绿的变化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戏剧服饰颜色的程式化端倪。

文中从中国传统服饰典章制度入手，针对汉唐参军角色，找寻其穿戴用色和同一时期《舆服志》中相关记载的关系，希望能为传统戏剧服饰的研究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思路，最终起到保护传统戏剧服饰文化、使其文化价值得以完整传承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 中国戏曲曲艺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2] 李昉. 太平御览[M]. 影印本. 北京:中华书局,1960.

[3] 金维诺,李遇春. 张雄夫妇墓俑与初唐傀儡戏[J]. 文物,1976(12):48-50.

JIN Weinuo,LI Yuchun. Tomb figurines of ZHANG Xiong and his wife and puppet theater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J]. Cultural Relics,1976(12):48-50. (in Chinese)

[4] 庆阳市博物馆,庆城县博物馆. 甘肃庆城唐代游击将军穆泰墓[J]. 文物,2008(3):40- 41,51.

Qingyang City Museum,Qingcheng County Museum. Tomb of MU Tai, a guerrilla general in Tang Dynasty, Qingcheng, Gansu [J]. Cultural Relics, 2008 (3): 40-41,51. (in Chinese)

[5] 中国戏曲研究院.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M]//段安节. 乐府杂录.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1959.

[6] 赵璘. 因话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7]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8] 马得志,张正龄. 西安郊區三個唐墓的發掘簡報[J]. 考古通讯,1958(1):49-51.

MA Dezhi,ZHANG Zhengling. Brief report on excavation of three Tang tombs in Xián suburb[J]. Kaogu Tongxun, 1958(1):49-51. (in Chinese)

[9]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 孙晨阳,张珂. 中国古代服饰词典[M]. 北京:中华书局,2015.

[11] 刘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 孟祥笑,游耀旺. 参军戏起源问题再探讨[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8(5):111.

MENG Xiangxiao,YOU Yaowang. Re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of the canjun drama[J]. Journal of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8,38(5):111. (in Chinese)

[13] 魏征.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14] 孔子. 四书五经[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

[15] 任半塘. 唐戏弄[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张 雪)

更正启示

刊登于《服装学报》2016 年第 1 卷第 4 期的《我国古代纸衣的历史渊源及发展》中,参考文献“[23] 释志磐. 佛祖统纪卷四十四[M]. 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有误,应为“[23] 慈怡. 佛光大辞典:卷 9 [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277.”,作者特此更正。

作者:王曦,梁惠娥
2020 年 10 月 10 日